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胡文远 范云

**【内容提要】** 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南亚都是“一带一路”的必经区域。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南亚也是中国陆上邻国最多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实施的六条经济走廊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面向南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投资格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当前，中国对南亚投资依然面临东道国投资壁垒、中国在南亚投资的产业集中度过高、中国对南亚投资易受非经济因素干扰以及中国在南亚小国投资受到西方国家和印度大肆宣扬的“债务陷阱论”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优化中国对南亚投资格局需要重视对南亚各国市场环境与投资风险的评估，结合东道国自身优势进行投资布局，避免非理性投资；考虑南亚各国的环境特殊性，以差异化投资为原则，找准利益契合点进行投资布局；政府要采取措施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配套制度，促进有效投资；重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的建设，营造有利于投资的民意基础与舆论环境。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全球化 对外直接投资 南亚

**【作者简介】** 胡文远，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助教、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经济，电子邮箱：40528297@qq.com；范云，江苏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辅导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经济，电子邮箱：fanyun4172020@163.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9JZD055）的阶段性成果。

**【DOI 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21.05.007.

## 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逐渐由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推动者转变为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实施者,对世界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趋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的持续发展,推动逆全球化升温并对全球经济秩序构成挑战。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重创全球经济,助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强势盛行,国际直接投资亦遭遇严重冲击,投资保护主义也呈现升级态势。从现状和趋势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加剧世界经济的衰退,引发更具浓厚色彩的基于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逆全球化思潮。可以预见,在“后疫情时期”,虽然“去全球化”不一定成为必然的趋势,但逆全球化的“惯性”会持续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加大“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和挑战。

无论是从陆地还是海上,南亚都是“一带一路”的必经区域。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时表示,中国愿同南亚国家携手努力,争取在未来五年将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到300亿美元。<sup>①</sup>南亚背靠喜马拉雅山脉,东面是东南亚,西北部是伊朗高原。而且,南亚的左翼是阿拉伯海,右翼侧是孟加拉湾,正好处于连接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这两个海上石油咽喉要道的弧形地带的中心。无论是从陆地还是从海洋看,俯瞰印度洋的南亚横亘在中国通向中东的重要通道上,关乎中国的贸易和能源通道安全。<sup>②</sup>此外,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南亚也是中国陆上邻国最多的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实施的六条经济走廊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面向南亚。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南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投资格局优化创造了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在世界格局迅速变化与周边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确定性选择,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方式、谋求与沿线国家深化经济合作以共同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但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南亚地区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但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如东南亚和中

① 《习近平:未来5年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至300亿美元》,人民网,2014年9月19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919/c1002-25691940.html>, 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② 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2页。

亚等地区,中国与南亚之间的合作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sup>①</sup>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前瞻性地从战略高度主动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适时地对在中国在南亚的投资布局进行优化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不仅有利于把握对外投资中的主动权,防止非理性投资加大交易成本甚至造成沉淀成本,而且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以及形成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联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梳理中国对南亚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对南亚各国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逆全球化趋势下优化中国在南亚投资布局的应对之策。

## 一、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进展巨大。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与南亚各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10亿美元,2016年达到1100亿美元,实现了翻番。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400亿美元。同年,中国对南亚投资6.1亿美元。截至2019年,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存量达112.48亿美元。中国成为南亚国家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也是南亚一些国家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科伦坡港口城等重点项目的持续推进,为深化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并将通过投资与产业合作的互动与协同发展,促进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当前,中国对南亚投资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与南亚各国经济互补性强,投资潜力巨大。南亚地区总人口17亿,占“一带一路”沿线人口总数的40%,南亚也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与中国和南亚的投资合作密不可分。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从688.1亿美元增长到1369.1亿美元,增长了近1倍。其中,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流量从4.17亿美元增长到18.03亿美元,增长了3.32倍。尤其是2015年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流量同比增长率为660.51%。投资存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中占比为8.2%,之后每年占比保持在7%左右。从投资存量方面来看,近10年来中国对南亚八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010年的

<sup>①</sup> 朱翠萍 《“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1页。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26.33 亿美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12.48 亿美元（见表 1）。虽然中国对南亚投资稳步增长，但截至 2019 年中国对南亚投资存量仅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5.12%，中国对南亚投资空间巨大，投资潜力还未得到有效释放。

表 1 2010-2019 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年份/指标	流量	增速	存量	增速
2010	4.17	--	26.33	--
2011	9.13	118.86	35.50	34.83
2012	4.41	-51.72	42.15	18.74
2013	4.63	4.95	58.06	37.75
2014	15.15	227.56	83.27	43.43
2015	11.50	-24.09	94.82	13.86
2016	6.93	-39.73	95.44	0.66
2017	10.87	56.78	116.79	22.37
2018	6.08	-44.02	111.07	-4.90
2019	18.03	196.30	112.48	1.27

数据来源 《2010-2019 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注 “--” 表示数据缺失

南亚地区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是各国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从比较优势来看，南亚各国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国与南亚贸易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农业、纺织、化工、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科技等诸多领域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空间广阔。另一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巴基斯坦总投资将达到 460 亿美元。当前中国对巴基斯坦已投资 250 亿美元，而且双边贸易近年来保持了 10% 以上的增速。

第二，中国对南亚投资覆盖除不丹以外的所有国家，投资趋势呈波动式增长。根据《2018 年“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国别合作度总体得分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中印贸易体量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排名第三。<sup>①</sup> 除此之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富汗与尼泊尔五国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并且在与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从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分布来看，中国对南亚的直接投资覆盖了除尚未与中国建交的不丹之外的所有南亚国家（见表2）。其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9年的投资流量高达5.6亿美元。同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达5.3亿美元，对孟加拉国的投资达3.8亿美元。2019年，中国对南亚投资最多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其次是印度。由此可见，除阿富汗外，近年来中国对南亚其他六国的直接投资均表现出不规律的波动式增长。

表2 2010-2019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情况（单位：百万美元）

国别/时间	阿富汗	巴基斯坦	不丹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	尼泊尔	斯里兰卡	印度	合计
2010	1.91	331.35	--	--	7.24	0.86	28.21	47.61	417.18
2011	299.54	333.28	--	--	10.32	8.58	81.23	180.08	913.03
2012	17.61	88.93	--	--	33.03	7.65	16.75	276.81	440.78
2013	-1.22	163.57	--	1.55	41.37	36.97	71.77	148.57	462.58
2014	27.92	1014.26	--	0.72	25.02	45.04	85.11	317.18	1515.25
2015	-3.26	320.74	--	--	31.19	78.88	17.47	705.25	1150.27
2016	2.21	632.94	--	33.41	40.8	-48.82	-60.23	92.93	693.24
2017	5.43	678.19	--	31.95	99.03	7.55	-25.27	289.98	1086.86
2018	-0.16	-198.73	--	-1.55	543.65	51.22	7.83	206.2	608.46
2019	24.08	562.16	--	6.94	375.49	206.78	92.8	534.6	1802.85

数据来源 《2010-201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注 “--”表示数据缺失

其次，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目的地。2019年，中国对南亚投资存量的近75%集中在这两个国家（见图1）。其中，巴基斯坦几

<sup>①</sup> 该数据来源于《2018年度“一带一路”数据大报告》。

乎占据了 中国对南亚投资的半壁江山，占比为 42.66%。紧随其后的是印度，占比略低于巴基斯坦，为 3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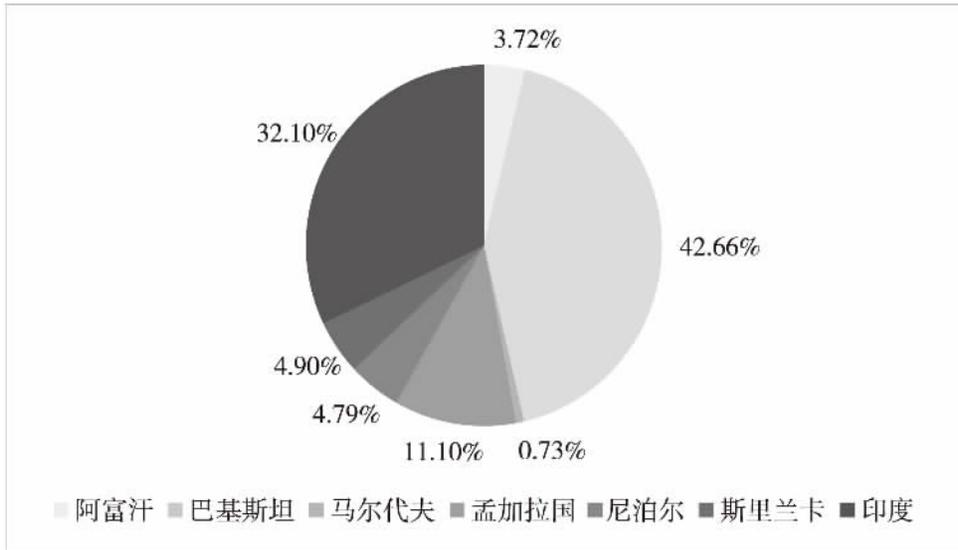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国别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 《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此外，由于阿富汗、尼泊尔等国经济发展落后，政治稳定性较差，投资风险大，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为发展援助等方式，投资规模较小。2019 年，中国对除印巴两国之外的南亚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当年对南亚投资存量的 25% 左右。其中，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及马尔代夫各自占比均小于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总量的 5%。

第三，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更多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规模较小。从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具体投资领域以及行业布局情况来看（见表 3），中国在能源开采合作、纺织制造业、大型机械设备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较大，在价值链较高的服务业行业投资相对较少。鉴于南亚各国的资源禀赋与地理优势，能源合作是中国企业在南亚的第一大热点投资，占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额的 58.58%。在中国企业投资南亚所涉及的众多领域之中，除了能源领域的投资，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也占了较大比重。除此之外，中国对南亚投资也流向技术行业、房地产业及金属冶炼业。

表 3 中国在南亚投资领域分布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投资领域	建筑合同	合同总额	占比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	占比
能源	28	16840	39.82%	70	55720	58.58%
交通	7	4050	9.58%	56	27370	28.78%
农业	3	510	1.21%	8	2860	3.01%
技术服务	12	3690	8.73%	10	2620	2.75%
房地产	7	2620	6.20%	12	2290	2.41%
公共事业	--	--	--	8	1610	1.69%
物流	2	670	1.58%	4	820	0.86%
旅游	2	1270	3.00%	2	770	0.81%
金属冶炼	6	7760	18.35%	3	450	0.47%
健康服务	1	1080	0.0255	1	200	0.0021
化工	--	--	--	1	400	0.42%
娱乐业	2	200	0.47%	--	--	--
金融服务	2	340	0.008	--	--	--
其他	11	3260	7.71	--	--	--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遗产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告》整理所得, 追踪时间为 2015 年至 2019 年 7 月

注: 此报告中只统计金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 “--”表示数据缺失

根据美国遗产基金会对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告的统计, 从 2015 年至 2019 年 7 月, 中国对南亚国家共计投资 175 项大型项目, 其中流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投资多达 56 项, 投资金额占比为 28.78%。签署的建筑合同共有 7 项, 金额占比为 9.58%。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与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的建设中, 投入资金均达到了 10 亿美元以上。这既满足了南亚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 又能充分发挥中国在基建工程领域的巨大优势, 而且很大程度上还帮助改善了当地的投资营商环境, 为后续在这些国家的物流、旅游等其他领域的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二、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中以产品输出为主，大量的产品输出将与对象国的产业形成竞争，并可能对对象国的就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不被对象国所欢迎，对贸易合作造成一定的制约。通过投资优化贸易结构并推动产业合作，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拉动当地就业，自然就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合作方式。而且以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也符合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中国与南亚地区的投资合作潜力巨大，但相比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投资潜力还未得到有效释放。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中国对南亚投资面临来自东道国的阻力，制约了投资潜力的有效释放。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二，投资总额达1369.1亿美元。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近2.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相比而言，2019年末，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仅为112.48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仅为0.51%，不足1%。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存量）总额远不及美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其中，中国对美国投资存量占总存量的3.5%，新加坡为2.4%，澳大利亚为1.7%）。<sup>①</sup>从2010到2019年，中国对南亚投资存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最高时仅为0.94%，也未能突破1%。当然，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在南亚各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占比除去个别年份之外，仍保持了稳定上升态势，但总体占比并不高，最高年份仅达2.75%（见图2）。与发达国家对南亚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规模存在不少差距，在投资规模上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由此，无论是在投资流量还是存量方面，中国对于南亚各国的投资不仅规模有限，而且呈现出投资布局极不均衡的局面。根据中国贸促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存量约为80亿美元，投资总量相比其他国家并不高。<sup>②</sup>

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② 潘圆圆《洞察印度加强对华投资限制措施的真实意图》，2020年9月1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842142363626091&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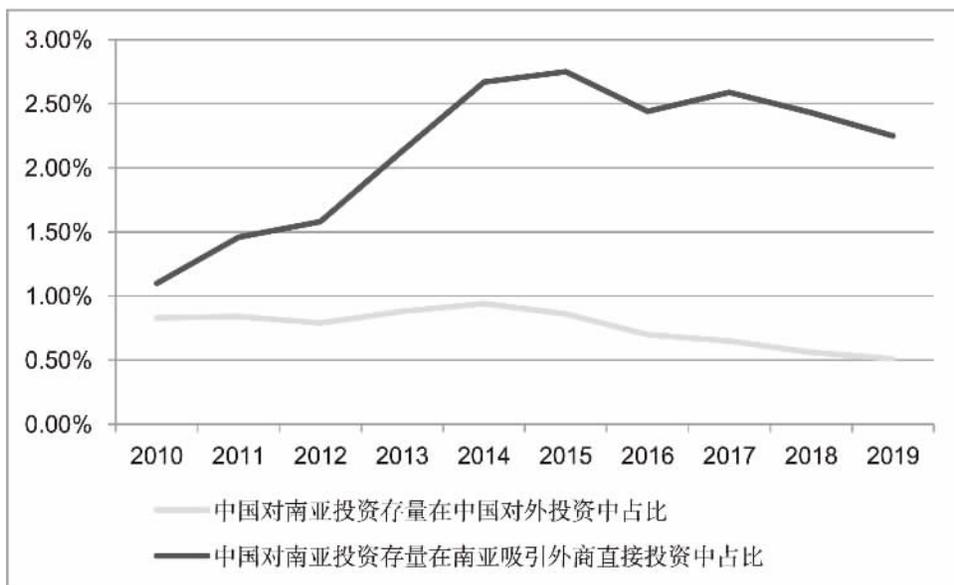


图2 2010-2019年中国对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 《2010-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UNCTAD数据库

注：因中国对不丹没有投资，该图未计算不丹的OFDI数据

首先，投资潜力难以有效释放与南亚国家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相关，中国对南亚大国印度的投资还与其对华投资壁垒密切相关。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国，中国对两国的投资规模远远大于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投资。2019年，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占巴基斯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0.14%。相比而言，中国对印度的投资规模也相对较大，但中国对印度吸收外资的影响程度却是最弱的，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规模仅占其吸引外商投资总额的1.21%，这与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并不相称。一定程度上与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印度对华设置的外资准入壁垒有关。2019年，印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各类投资者的限制措施，投资领域涉及绿地投资、政权投资、风险投资和兼并收购等领域。

其次，中国对南亚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如前所述，中国对南亚投资75%集中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但中国对阿富汗和尼泊尔的投资占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高于巴基斯坦和印度。2019年，中国对尼泊尔投资存量占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19.57%；阿富汗的这一比例为25.78%（见图3）。相比而言，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阿富汗这五个国家

##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南亚直接投资的特点、问题与对策

的投资壁垒相对较低，规定只要满足其国内投资法规即可，并无特殊的限定。但中国对这五个南亚国家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除了投资环境与投资政策等经济因素外，与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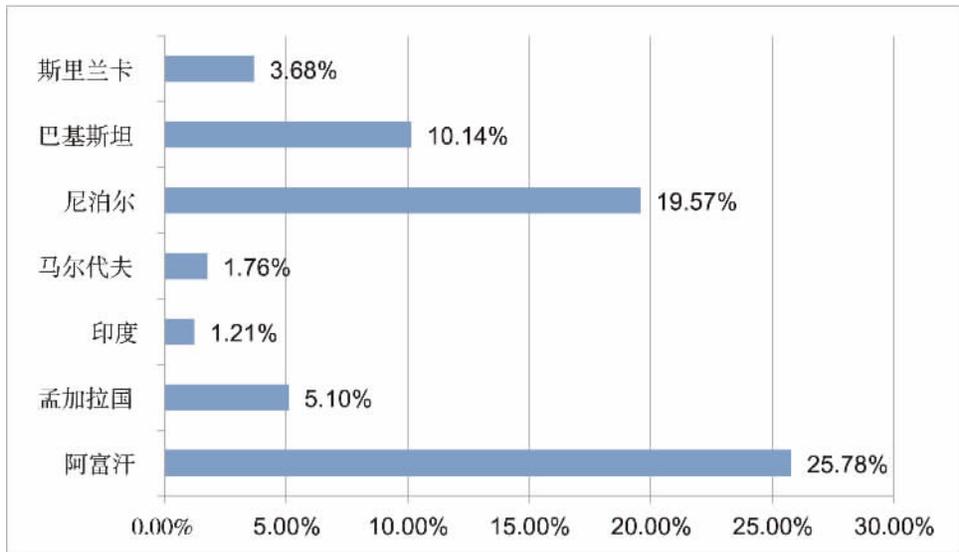


图3 2019年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存量占其引进外资存量占比

数据来源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及UNCTAD数据库

第二，中国在南亚投资的产业集中度过高而增加了企业投资风险。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业分布在2018年首次实现了全行业覆盖。<sup>①</sup>截至201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产业有6个。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及采矿业。从中国投资南亚的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受南亚各国投资环境及整体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较弱影响，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行业覆盖率水平不仅低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而且也低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亚等其他区域的投资布局水平。从产业分布情况而言，中国对于南亚直接投资超过80%的资金都集中在能源开采领域以及机械制造、纺织业等附加值较低的第二产业，而对金融业、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投资

<sup>①</sup> 相关数据来源于《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较少。<sup>①</sup> 具体来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更多集中在电信、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工程机械等行业。投资额度较大的企业包括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特变电工、中兴通讯、三一重工、海尔集团、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sup>②</sup> 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主要涉及电力、水利、交通、机场、港口、资源开发等领域。其中,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在巴投资的重中之重,在此框架下的投资项目包括铁路和公路网、天然气管道、工业园区及瓜达尔港等的建设。<sup>③</sup> 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投资的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中航国际(香港)集团公司投资的科伦坡三区公寓等项目。此外,中国民营企业赴斯里兰卡投资发展迅速,投资领域涉及酒店、旅游、农产品加工、渔业、家具制造、纺织、生物质发电、仓储物流等多个领域。<sup>④</sup> 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资领域包含能源、服装、纺织、陶瓷等领域,主要投资企业有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公司、利德成服装公司、新希望孟加拉国有限公司等。<sup>⑤</sup> 目前,在尼泊尔投资的中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水电站、航空、餐馆、宾馆、矿产、食品加工等行业。<sup>⑥</sup> 中国对阿富汗投资的主要项目有阿姆河盆地油田项目和埃纳克铜矿项目。<sup>⑦</sup> 而在马尔代夫投资多以基础设施及住房建设为主。<sup>⑧</sup> 总体上,目前中国对南亚投资布局过于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等所需资金庞大、收益回报期长的项目,容易为投资企业带来经济风险,增加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的脆弱性,影响投资的可持续性。

第三,中国对南亚投资易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影响了中国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南亚属于政治、安全、社会风险较为集中的区域,这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推进面临巨大挑战。对于那些愿意“走出去”投资的中国企业,在南亚的投资除了面临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还极易受到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还会受到大国因素的干扰。首先,虽然南亚多数

① 相关数据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遗产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告》整理所得,追踪时间为2015年至2019年7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印度-2019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巴基斯坦-2019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斯里兰卡-2019版》。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孟加拉国-2019版》。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尼泊尔-2019版》。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富汗-2019版》。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马尔代夫-2019版》。

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接受和欢迎态度，但南亚唯一具有“大象体量”的国家印度，对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持疑虑甚至否定态度。虽然印度本身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消极态度也未必就能对“一带一路”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但印度会通过干扰南亚邻国的参与而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制造障碍，这一点显然不能忽视。<sup>①</sup> 其次，南亚国家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在内的国家，政局不稳造成投资政策频繁变动，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预期与收益。根据《2019年“一带一路”能源资源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报告》，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中等政治风险国家；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和阿富汗为较高政治风险国家。<sup>②</sup> 特别是中国在南亚投资多涉及基础设施、能源、机械设备等重大项目的合作，此类项目均具有投资大、成本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同时，由于能源的“政治属性”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敏感性，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治因素的影响。2015年1月，由于曾经大力支持“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建设的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竞选连任失利，新任政府以项目的可行性评估不足及环境影响为由重审港口城项目，由此为中国企业投资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再如，尼泊尔更是政局频繁变动的代表性国家，2008年尼泊尔正式取消王权统治，开始酝酿起草民主宪法，朝着建立民主联邦政体的方向迈进。但是，过渡期间频繁发生政府更迭，民主宪法终于在2015年颁布，民主选举在2017年实施。2018年初，终于建立由联邦、省和地方三级政府组成的联邦政体，但是，尼泊尔的政局仍然存在较大的潜在危机。虽然尼泊尔政局在2018年后趋于稳定，但投资环境及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遗留问题的影响，无形之中增加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再次，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等安全问题弱化了中国企业在南亚投资的积极性。南亚国家属于全球恐怖事件的高危频发地，不仅存在极端暴力与恐怖势力，部分国家政府还持续受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的武装袭击。例如，根据印度官方统计，印度目前共有66个活跃的恐怖组织存在。2019年6月发布的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显示，阿富汗已取代叙利亚成为全球最不安全的国家。由于政治和安全的不确定性，阿富汗近几年的国际投资吸引力显著下降。<sup>③</sup> 巴基斯坦则一直处在国际反恐的前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恐怖主义袭击的国家之一。根据巴基斯坦官方

① 朱翠萍 《“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2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尼泊尔—2019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阿富汗—2019版》。

统计数据,从2017年3月到2018年5月,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袭击共造成巴基斯坦613名平民伤亡。2018年7月13日,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默斯东地区一政治集会现场发生自杀式的爆炸袭击,造成了149人死亡以及186人受伤。这也是近几年来在巴基斯坦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之一。<sup>①</sup>同时,南亚国家多属于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南亚地区分布着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信仰,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种族与民族对抗极易催生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甚至有部分国家的政治利益集团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利用民族本位主义大行其道,鼓动普通民众的极端情绪,引发社会动荡。<sup>②</sup>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宗教信仰冲突带来的潜在风险,给中国企业在南亚投资造成一定困难,弱化了中国企业在南亚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四,中国在南亚小国投资受到西方国家和印度大肆宣扬的“债务陷阱论”的制约。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宣扬“资源掠夺论”和“债务陷阱论”,其主要观点包括:中国通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大型基础设施等项目并提供高额贷款,使东道国无力偿还贷款导致项目投资中止,进而迫使东道国让渡项目控制权乃至主权以换取债务的减免。<sup>③</sup>以斯里兰卡为例,2011年以来斯里兰卡外债负担虽然不断扩大,但偿债风险预期可控,其外债问题主要由生产、外贸、财政支出及债务管理等内部结构失衡所致,来自中国的贷款对斯里兰卡外债危机影响不大。<sup>④</sup>虽然“债务陷阱”说法缺乏依据,属于恶意炒作,但一定程度上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在南亚的投资布局增添了阻力。南亚国家尤其是除了印度之外的南亚小国,都有与中国投资合作的意愿和需求。但由于这些国家缺乏资金,尤其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庞大资金支持,不可避免地需要来自中国的援助,甚至需要向中国贷款来开展合作项目的实施。这成为美国和印度等国攻击中国投资和阻止“一带一路”推进的“抓手”,从而干扰了中国与包括巴基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在内的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增添了中国企业投资的政治风险。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巴基斯坦-2019版》。

② 张述存《“一带一路”战略下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的思路与对策》,《管理世界》2017年第4期,第7页。

③ 金刚、沈坤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发展效应还是债务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9期,第80页。

④ 李艳芳《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生成逻辑与争议辨析》,《国际展望》2020年第1期,第108页。

### 三、优化中国对南亚投资格局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持续增长的境外投资凸显了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根据《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据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三者占据了当年投资流量的47%。我国对南亚直接投资多分布在基础设施、能源开发、纺织等领域，这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布局极其不符。<sup>①</sup>同时，投资中依然存在重项目轻实效以及重短期利益轻投资可持续性问题，甚至存在“脱实向虚”、借投资来转移资产等非理性投资现象。因此，现阶段如何实现理性投资的回归，防止非理性投资造成的资源错配，并通过优化南亚投资格局提升中国与南亚产能合作的质量，无论对于扩大中国对南亚投资规模、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网络化格局形成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重视对南亚各国市场环境与投资风险的评估，结合东道国自身优势进行投资布局，避免非理性投资。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通过将资本、技术、品牌和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流动到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与土地、劳动力、环境等不可移动的初级生产要素结合，有助于实现产业转型并促进经济扩张。我国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充分评估南亚各国市场环境和投资风险的基础上，通过投资布局，将资本、技术、品牌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流动到南亚地区，使得这些生产要素与当地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从而在提高东道国生产效率的同时，通过投资与产业的协同发展，助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具有经济发展滞后、制度环境脆弱、政治局势动荡和安全局势堪忧等特征，加大了外来企业的投资风险。中国在南亚的直接投资除了追求扩大投资规模之外，更应该注重提升投资质量和保障投资安全，结合东道国自身优势展开针对性投资以对接东道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在对南亚的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在内的三大风险，而且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会给企业增加投资风险。应该重视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评估，跟踪分析东道国投资政策趋势，特别是对中国投资的态度变化。同时，选择投资政策中的关键变量构建评估体系，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做综合评估，避免非理性投资和资源错配，降低投资的不确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定性并减小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充分考虑东道国制度风险,秉持市场竞争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sup>①</sup>在政府的引导下遵循市场规律,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二,考虑南亚各国市场环境的特殊性,以差异化投资为原则,找准利益契合点进行投资布局。从目前中国在南亚投资布局的国别分布来看,中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投资远超其他国家的投资总额,印巴两国作为两大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重要国家,继续扩大对印巴两国的投资无疑是必然选择。但与此同时,应该重视对南亚其他国家市场的开拓和差异化投资。尽管南亚所有国家都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共性问题,使得短期内投资难以收获预期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企业对南亚的投资热情。为此,从南亚各国的产业优势角度出发,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投资,以减小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效率。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投资,除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瓜达尔港、海尔-鲁巴经济区等重点项目建设区成果之外,还可重点考虑机械设备、食品加工和农业等领域的产业合作。与此同时,考虑到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对华投资的谨慎态度,除了探索基础设施投资合作之外,可拓展在信息技术、医药、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相互投资。孟加拉国人口密度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作空间巨大。作为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服装加工业是孟加拉国的支柱产业,中国企业可到当地开展相关投资。对于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的斯里兰卡,除了科伦坡港口城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可持续推进以深海养殖、远洋捕鱼、海水淡化、海岛旅游等相关领域的合作,并深化中斯两国在海上救援、航道建设、海洋环保等领域的合作。除此之外,两国还可合作建立高新科技园区、海洋人才培养基地、海岛经济示范区,培养具有跨国经营水平的高端人才。在马尔代夫,除了继续加强对旅游岛基础设施投资之外,应该进一步加强渔业合作、民生项目工程承包以及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企业对尼泊尔的投资应将重点放在水电站、基础设施和旅游等领域,在尼泊尔政局稳定之时,逐渐加大对尼泊尔的投资规模。虽然中阿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但是鉴于阿富汗目前不稳定的安全局势,中资企业应深入调研、谨慎决策,在全面做好安防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和推进投资合作。

---

<sup>①</sup> 蒋冠宏、蒋殿春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第55页。

第三，政府要采取措施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配套制度，促进有效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能否顺利推进，一定程度上也与东道国制度存在关联性。“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经济体在技术、管理等方面与中国相比存在比较劣势，尤其是企业吸引外资方面需要国内政府的政策扶持。<sup>①</sup> 鉴于国际直接投资涉及一国投资者跨越国界到另一主权国家进行投资合作，企业在涉外投资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与挑战。而且，南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信息不透明现象。为此，在政府层面，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经营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具体而言，首先政府要构建企业对外投资的公共服务平台和风险预警机制。政府应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努力为涉外投资的企业创造更完善的境外投资平台，提供包括东道国的文化偏好、政治风险、投资法律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地通过官方平台向外界发布各国对外投资指南和对外投资公报等有助于帮助企业了解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政策报告。其次，针对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无法避免的各种投资壁垒，政府要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在企业立案、调查、诉讼与采取措施等各个环节进一步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建立更为完善的关于投资壁垒争端解决机制，帮助中国企业积极应对与解决投资壁垒和投资争端。<sup>②</sup> 再次，鉴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印度难点，短期内中国与南亚的投资合作应该重点考虑双边合作。一旦本国企业投资者置于东道国的主权范围内，就会处于博弈的弱势方，要积极同南亚各国签订或升级双边投资协定（BIT）。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将东道国的承诺上升为国际法的范畴，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性，能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南亚大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且不稳定，投资政策“朝令夕改”的可能性大，容易损害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双边投资协定不仅灵活便利，且针对性强，是目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法律来源，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目前来看，中国已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阿富汗、印度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而与尼泊尔、不丹则尚未签订相关协定。其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有待于升级和重新签订。此外，还要加大南亚各国投资政策与投资壁垒的研究力度，建立关于投资政策与投资壁垒的数据库，提高企业应对投资壁垒和投资风险的能力。

① 钱进、王庭东 《“一带一路”倡议、东道国制度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GMM的经验考量》，《国际贸易问题》2019年第3期，第102页。

② 周俊 《南亚国家投资壁垒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对策建议》，《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第36-43页。

第四, 重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的建设, 营造有利于投资的舆论环境。当前,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极其复杂。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代表的是中国形象, 因此应该重视企业自身在海外的形象建设, 促进经营本土化, 努力回馈当地社会, 以良好的声誉和形象奠定对外投资的民意基础。企业除了深入了解当地的需求和民生领域面临的问题, 如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努力帮扶东道国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以及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还要重视当地生态环境, 科学评估投资项目的排污情况及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其他影响, 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 确保企业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应。除此以外, 还要学会与当地媒体打交道, 做好公关舆论工作, 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 营造有利于投资的舆论环境。良好的舆论环境, 不仅有利于更多企业走出去投资, 而且还能成为促进两国政治互信的催化剂, 减小投资的政治风险。

## 结 语

在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 各国经济复苏势头依然乏力的背景之下, 通过投资促进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 是各国规避贸易壁垒并通过“抱团取暖”以突破增长瓶颈和获得增长动力的主要路径, 也是通过各国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主义的重要途径。在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时, 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倾向不断加剧, 除了关税壁垒之外, 还通过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向调查等各种名目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因此,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绕开一些国家的贸易壁垒, 实现海外市场份额的拓展。<sup>①</sup>

当前, 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早期收获和示范效应, 中国在南亚直接投资布局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尤其是,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面向南亚, 为中国对南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投资格局优化创造了机遇。但更应当认识到的是, 除了南亚投资中的印度难点, 中国对南亚投资依然面临东道国投资壁垒、中国在南亚投资的产业集中度过高、中国对南亚投资易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及中国在南亚小国投资受到西方国家和印度大肆宣扬的“债务陷阱论”等因素的制约, 使得中国在南亚的直接投资布局依然步履维艰。这些因素归根结底来源于三方面: 一是东道国投资环境复杂。南亚各国均为发

---

① 宋勇超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6期, 第83页。

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制度环境脆弱，而且政局动荡不稳，大大制约了中国企业在南亚的直接投资的发展。二是中国对南亚投资受南亚大国印度因素的影响。印度一直以来都将南亚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对中国在南亚的投资怀有天然的抵触，不可避免地想方设法干扰中国在其他南亚小国的投资活动。如何突破印度难点，化解中印互信困境，使合作红利尽快释放外溢到投资领域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问题。三是中国自身因素。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涉外投资方面起步较晚，能够“走出去”且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还相对缺乏，对南亚各国各自的合作意愿、合作需求与合作领域等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各取所需”。

总之，优化中国对南亚投资格局需要重视对南亚各国市场环境与投资风险的评估，结合东道国自身优势进行投资布局，避免非理性投资；考虑南亚各国的环境特殊性，以差异化投资为原则，找准利益契合点进行投资布局；政府要采取措施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配套制度，促进有效投资；重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的建设，营造有利于投资的舆论环境。当然，也需要在优化投资布局的基础上，尽快培育一批具有跨国经营优势的企业以及高层次人才。我们相信只要付诸努力，多管齐下对症下药，中国与南亚地区的投资合作就一定能打开新局面，跨上新台阶。

(责任编辑 胡文远)

shown dynamic change and diversified expansibility, and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work constructed by the four states has also undergone a complex evolution process. The article uses social network theory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ogic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work. In 2017,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restarted, and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entered upon a new phase. The four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build various security cooperation sub-networks through updating and widening the cooperation agenda, exploring different levels of cooperation frameworks, and gradually forming a limited open and complex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The density of this network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U. S. has the highest “centrality” and obvious dominance in the current network which presents a “center – edge” structure. But it is still a loose network, showing instabil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o being affected by variou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evolution of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network has its endogenous mechanisms, including reciprocity effects and structural dependence effects. Although the functions of present network are not single,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De – Sinicization” deserves great attention.

**Key Words:** U. S. – Japan – India – Australia, the Quadrilateral, Agenda Evolution, Network Construction

### **Th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RI**

Hu Wenyuan, Fan Yun

**Abstract:** Whether from land or sea, South Asia is a necessary area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China is the largest neighboring country of South Asia, and South Asia is also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China’s neighbors on land. Among the six economic corridors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under the BRI, both the Bangladesh – China – India – 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 and the China –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outh Asia, which means BRI has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optimizing the location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pattern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At present, China’s investment in South Asia is still facing some

## CONTENTS

barriers from the host countries including higher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non – 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as the “Debt Trap Theory,” which is widely publiciz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dia.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optimize China’s investment pattern in South Asi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assessing risks of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policy. Al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provide services and guidance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global.

**Key Words:** BRI, Globalization, OFDI, South Asia